

# 未来与发展:新时代中国国际体育话语权的构建\*

汪雄<sup>1</sup>,陈玉林<sup>1</sup>,白丽佳<sup>2</sup>,周山彦<sup>3</sup>

(1. 玉溪师范学院体育学院,云南玉溪 653100;2. 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云南昆明 650500;  
3. 文山学院体育学院,云南文山 663000)

**摘要:**新时代中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迈进过程,也必定是争取和赢得体育国际话语权的过程。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条件下,努力加强和提升中国国际体育话语的力度和效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和加快实现中国体育强国梦的重要举措,也是构建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内容。鉴于此,对中国体育国际话语权的研究,必须要在国内外“话语权”的理论基础上,梳理体育话语权的演变历史,并结合当今时代背景下的机遇与挑战,综合不同体育领域、不同体育群体、不同方式和途径等层面,深入研究中国国际体育话语权的提升路径,进而体现纵深性而又具全面性。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国际体育话语权;内涵体系;构建路径

**中图分类号:**G8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404(2018)87-0073-04

## 1 体育话语权的内涵体系

西方对话语权的研究渊源于“话语”,话语最初只是一个相对单纯的语言学概念。后来,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索绪尔等对“话语”论说的基础上,话语理论逐渐变得更具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最后,逐渐形成三种主要流派:1. 以葛兰西、阿尔都塞、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他们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持批评态度,或主张争夺话语权,或倡导话语民主权;2. 以福柯、利奥塔、布迪厄、贝克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学派,他们拒斥元叙事,关注个体的、碎片化的话语权,使其话语权的研究更加关注个体的话语权利;3. 以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学派,他们反对帝国主义或强势群体的话语霸权,主张平等包容,消解西方话语霸权,认为弱势群体(被压迫种族、被统治阶级、被歧视性别)也要发出自己真实的话语,逐渐将话语权的研究转向或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话语权的表达。

话语权是当今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纵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话语权的研究可归纳为四种概念的认

知。1. 话语权即权力。1971年米歇尔·福柯首次在《话语的秩序》中提出“话语即权力”的论述。受其影响,布迪厄指出每一次语言交流都包含了成为权力行为的潜在可行性(费爱华,2009),说明话语权具有隐藏和显现的两种特征。国内部分学者也持有相同观点。认为影响、控制“话语”的最根本因素是权力(庾继光,2007),话语是权力的一种载体和表达方式(张志洲,2012),而国际话语权作为话语权的延伸,是国家间的权力关系的外显表达(张睿蕾,2012);2. 话语权即权利。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一般都是从语言学和传媒学角度去理解和认识话语权的观念,认为话语权就是人们为了充分表达思想、进行言语交际而获得和拥有说话机会的权利(冯广艺,2008);3. 话语权即权力和权利。刘学义(2008)、张健(2008)均认为话语权既是一种说话的“权利”,也是一种说话的“权力”;4. 话语权即影响力、能力或权威等。认为国际话语权是在国际舞台上说话和发言的权利,影响和调控国际舆论的权力(王庚年,2009;周锡生,2009),是某种国际行为体的意识形态及理念的吸引力(乔夏阳等,2010),也是一种精神力量的展现,是一个国家就国家事务和相关国际事务发表意见的权威度和影响力(陈力丹等,2010)。以上四种认知依次从话语到话语权、从话语权到媒介话语权、从媒介话语权到软实力等阐述了话语权及其产生、发展与流变。

国内对话语权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90年代艺术和文学等领域,1994年金元浦与陶东风在《从

收稿日期:2018-06-12

作者简介:汪雄,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体育文化传播等方面的研究;通讯作者:周山彦,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体育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E-mail:wangxiong8317@126.com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体育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构建研究(13BTY005)。

碎片走向建设——中国当代审美文化二人谈》一文中较早使用了“话语权”一词。他们认为:“当批评家不再为建构文化价值、人文精神而探索时,话语权就只能成为唯一的‘猎物’和财富”。关于“话语权”概念的研究,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逐渐兴起。冯广义(2008)、张国炸(2009)、汝绪华(2010)等探讨了话语权的内涵及流派,认为“话语权就是说话和发言的资格和权力”;廖小琴(2015)、朱培丽(2015)、李礼(2017)分别研究了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内涵、变化、挑战与重构等;丁和根(2000)、彭泳(2003)等批判了大众媒体的话语霸权;冯甘雨(2014)、赵明珠(2015)、刘忱(2017)等则研究了互联网背景下的话语权转向问题。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加深,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研究也备受关注。梁凯音(2009)、李智(2010)、邹应猛(2010)、陈正良(2014)等从宏观的角度总结了国际话语权内涵。梁凯音(2009)则分析了国际话语权的构成要素包含“话语者、话语内容、话语对象、话语方式、话语平台和话语效果”。李智认为“目前对国际话语权的研究主要是指话语的权力,国际话语权是国际话语所生成和施行的权力,国际话语权的实质是国际定义权”。陈正良等也认为,“国际话语权不仅是一个国家在世界上说话的权利,更是指说话的威力与有效性,本质上体现的是一国在国际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与影响力,是国际政治权力关系的现实反映,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构成和体现。一国话语权的内容包含了该国对国际舆论的主导力、参与制定国际标准与游戏规则的决定权、主导国际机构和组织的能力、影响国际价值观的能力和全球利益分配的决定能力等(陈正良,2014)。”邹应猛则分析了不同的国际话语权行为主体,“国际话语权作为话语权的延伸,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使其显示出更为多样的特征。国际话语权涉及更多行为体,囊括了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及其广大民众;争夺领域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传媒、军事等诸多国际领域(邹应猛,2010)。”

体育领域中相关话语权的研究直到2006-2007年才仅寥数学者提及。如,唐东辉(2006)探讨了当代传媒话语权下的女性体育文化发展,张江南(2006)分析了体育报道中的女性失语,张大志(2007)指出全球化下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是话语权而是生存本身的危机,王湧涛(2007)却提及中

国武术文化的失语与话语平台构筑。但是,以上学者均只是提及却并未对国际体育话语权进行专门研究,2008年后关于其概念内涵等研究才成为一个渐显的主题。如,廖莉(2014)系统研究了国际竞技体育话语权的内涵,她认为“一是话语权是特定机构特有的,包括物质权力单位和特定文化权力场所;二是话语权产生于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交往,经过进一步研究后,她还认为“国际体育话语权是以竞技运动为主的国家或地区之间交往活动中的一种特定的权力。这种权力仅存在于国际体育组织当中,产生于国际体育事物管理之间的交往,反映的是交往活动中所处决策地位的不对称关系。”;王爽等认为“体育国际话语权,不仅是在国际体育事务中说话的权力,更是一种处理国际体育事务的权力,是依靠争夺才能取得的权力”。梁立启研究指出,“体育的话语权是体育话语表达权利与权力的统一,是话语主体将隐含自身价值的体育话语通过教育、媒介和制度等方式向全世界表达,最终获得国际认可的行为和过程。一个国家的体育话语权大小,直接取决于该国在国际社会中体育实力的强弱。

## 2 中国体育国际话语权的现状与问题

部分学者对不同体育领域、不同体育群体、不同途径平台等体育话语权的具体层面进行了细致研究。竞技体育和民族传统体育中的话语权问题引发关注。廖莉(2014)研究了国际竞技体育话语权的特征、问题及提升等问题;孙科(2012)、谭达顺(2013)、陈晔(2013)等基于奥运会中不公平事件谈及中国国际体育话语权的弱势;沈宇鹏(2010)、李羽(2012)则研究了国际体育组织中的话语权问题。而武术作为民族传统体育的代表,其话语权问题也成为探讨焦点。王海(2013)指出,武术应回归身体层面、借助媒介推力才能谋取生存空间和话语权力。李源(2013)认为,批判继承和综合创新是社会转型期武术重拾话语权的途径。体育话语权的提升不仅要兼顾不同体育领域的发展平衡,而且要注重不同体育群体利益的表达。张世威(2008)、高嵩(2013)、夏青(2014)等研究了弱势群体(农民工、女性)的体育话语权利的保障问题。通过体育媒体和体育外交等途径方式提升中国体育话语权的研究也并不鲜见。陈颖(2014)则研究了体育危机事件中媒体的话语权问题。虞继光(2008)、黎彬(2010)、

王晓(2011)等则论说了大众媒体和信息技术环境下精英与大众体育话语权的平衡。而在体育外交与体育话语权的研究中,罗时铭(2009)关于新中国体育对外交往60年的回顾、李舜慧(2012)对后奥运时期中国体育外交的研究。另外,中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迈进过程也必定是争取体育国际话语权的过程。

### 3 中国国际体育话语权的提升策略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体育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其与体育国际话语权弱势之间的矛盾,使提升中国体育话语权成为全球化时代的诉求。为此,诸多学者在界定体育话语权内涵的基础上,从一般性角度对中国体育话语权的现状问题及提升策略展开了探讨。如,梁立启(2014,2017)认为,体育话语权是体育话语表达权利与权力的统一,提高体育话语质量,优化话语环境,防范话语威胁等是重要路径;程雪峰(2015)指出,体育话语权是指对国际体育事务的解释权、对国际体育标准和体育项目规则的制订权及对是非对错的评议权、裁判权,对此发挥媒介推力、壮大体育文化实力是关键;曾诚(2016)也谈及提升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吸引力、积极参与国际体育事务、增强中国体育话语体系的重要作用;张晓义(2017)则较全面地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做好议程设置、加强理论研究、打造话语平台、扶持华侨社团、建设外交队伍等应对方略。张斌(2011)、魏统朋(2013)、刘晓丽(2015)、廖理连(2015)等就在体育强国建设研究中论及中国体育话语权的弱势以及提升。如何通过体育媒体传播提升中国话语能力,以及互联网、大众媒体中体育话语权的转向成为研究的焦点。房学峰(2012)、陆攀(2015)等从体育新闻媒体报道的特点与不足中谈及如何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和话语权;王露露(2013)对1995年-2008年中国体育外交发展的研究等,大多在梳理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国体育外交中展望其对中国话语权提升应有的贡献。谢宜轩给出在国际体育组织中中国话语权提升的对策:“密切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加强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后备人才培养的工作建设;提高专业体育媒体的培养工作”。张鲲鹏等认为提升竞技体育话语权方法包括“向世界传播中国体育文化和价值观念、积极参与体育国际事务、提升自身竞技体育实力、解决语言障碍,提高

英语水平。”陈晔建议,通过“加强我国体育人的话语权意识、提高维权能力、加强高层次裁判队伍建设、提高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任职人员的数量和质量等措施增强我国体育话语权。”

### 结论

在当今国际交流与传播中,话语权已经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系到一个国家在世界舆论领域中的地位,影响到一个国家国际形象的建立。目前国内话语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话语权、意识形态话语权以及弱势群体话语权的上,分别对应西方话语理论三种流派,并将其作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构的核心指标。从话语到话语权的理论发端,再到不同领域和流派对话语权探讨的延伸,使体育话语权的研究有了丰富的理论基础。而从何为体育话语权到中国体育话语权的缺失,再到一般或具体层面体育话语权的提升,中国对体育话语权的研究也在不断丰富和深入。但整体来说,以往的研究均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内涵体系或完善的构建和提升的策略,因此,研究的理论性和系统性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和不断加强。尽管从体育媒介和外交等不同途径、竞技体育、民族传统体育等不同领域等探讨了体育话语权的提升,然而,研究的成果仍较为零散,如涉及互联网、新媒体传播下的中国体育话语权提升,对此类研究尚处于初探阶段,还有待于继续深入挖掘和系统升华。基于上述文献研究的不足和一定程度的理论欠缺,对体育国际话语权的研究,必须要在国内外“话语权”的理论基础上,梳理体育话语权的演变历史,并结合当今时代背景下的机遇与挑战,综合不同体育领域、不同体育群体、不同方式和途径等层面深入研究中国国际体育话语权提升,从而既体现纵深性又具有全面性。总而言之,中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迈进过程也必定是争取和赢得体育国际话语权的过程。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条件下,努力加强和提升中国国际体育话语的力度和效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和加快实现中国体育强国梦的重要举措,也是构建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内容。

### 参考文献

- [1] Michel Foucault. *Ordre du discours*[M]. Paris: Gallima-

- rd, 1971; 21.
- [2] Said Edward. "Michel Foucault" , in *After Foucault: Humanistic Knowledge, Postmodern Challenge* [M]. Lond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8: 1.
- [3] 张国炸. 关于“话语权”的几点思考[J]. 求是, 2009(9): 43-46.
- [4] 梁立启, 栗霞, 邓星华, 等. 我国体育话语权的产生基础与有效发挥研究[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7(7): 20-25.
- [5] 程雪峰. 媒介推力与文化强势: 对中国体育话语权缺失的再认识[J]. 体育与科学, 2015(5): 123-126.
- [6] 张晓义, 永树理. 中国体育国际话语权: 现实困境与提升方略[J]. 思想战线, 2017(4): 144-153.
- [7] 曾诚, 邓星华. 体育国际话语权与中国国家形象构建[J]. 体育学刊, 2016(2): 39-42.

## Future and Develop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ports Discourse Right in the New Era

WANG Xiong<sup>1</sup>, CHEN Yulin<sup>1</sup>, BAI Lijia<sup>2</sup>, ZHOU Shanyan<sup>3</sup>

(1.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Yuxi Normal University, Yuxi Yunnan Province 653100, China;

2.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Yunnan Province 650500, China;

3.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Wenshan University, Wenshan Yunnan Province 663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China's progress from a sports country to a sports power is also a process of striving for and winning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right of sports. Under the important conditions of the great achiev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build the socialist sports cau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o accelera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dream of China's sports power.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building and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of China. In view of this, the study of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right of Chinese sports must b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discourse power" at home and abroad, to comb the history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right of sports discourse, and to combine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present times, and to study the Chinese country deeply in different sports fields, different sports groups, different ways and ways. The way to enhance the right to speak of sports is to be profound and comprehensive.

**Key words:** new era; China; international sports discourse right; connot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path